

试析通过中国东中部合作促进中部崛起的意义与途径*

王成至¹

摘要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触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变得紧迫起来，反映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上，就是转变由沿海到内地的线型区域发展思维，实行“东西和谐”、“南北合作”的面型区域发展思维，而中部崛起是这一转变当中的重要一环。“中部崛起”有一系列条件作为支撑：1、拥有较好的农业基础；2、有较为集中的工业布局；3、能源比较丰富；4、人才优势也比较明显。这决定了中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中部崛起仍然受到一些因素制约：1、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虽然形成了第二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但各省工业产品结构趋同，产品集中度和生产集约化程度比较低，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比较弱。2、自主创新能力弱，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投入、该地区获得的专利数目都比较低。3、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的现象仍比较普遍。4、吸引区域外生产要素流入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部地区本身的一些行业受到影响，东部地区的轻工产业受到冲击后，对中部发展劳务经济的努力构成打击，中部各省之间对外来资本的争夺也更趋激烈。针对这些矛盾，中央政府和中部各省都出台了相应政策，力图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等途径，缓解金融危机对中部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然而，中部崛起离不开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的合作与联动。一方面，金融危机推动了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对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活动，使东部的发展危机得到了缓和；另一方面，东部也为中部崛起提供市场、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国际交流平台。东中部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产业的比较优势，在推动中部崛起的同时，也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中部崛起 东中部合作 和谐发展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变得紧迫起来，而推动中国中部地区的崛起，不仅对于消除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省份之间围绕中部崛起开展积极的合作，是推动中部崛起和促进区域经济和諧发展的重要内容。

I. “中部崛起”的意义与条件

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一、轻工业和电子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产生了“长三角”、“珠三角”两个重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二、中国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以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严重的环境代价，换取相对微薄的利润；三、在收益分配上，中国内陆地区主要是通过向沿海地区和境外输送劳动力以及资源

型产品，获得递减的利润。这种发展模式在带来 GDP 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也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严重、环境迅速恶化等问题，危及到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1] 2008 年底，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总的来看，中国与外贸相关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比较严重，沿海地区一批企业或倒闭，或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就业问题一度比较严峻，农民工返乡流曾使危机有在内地蔓延的趋势。[2] 就实质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孕育的危机因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而凸显。危机在客观上形成压力，推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转变区域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实际上，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上述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开始着手进行调整，“扩大内需”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些年中，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也逐渐改变了由沿海到内地的线型发展思维，开始实行“东西和谐”、“南北合作”的面型发展思维。“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以及“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正是顺应这一调整而应运而生的。[3] 实行更为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带动更广泛地区的人口走向富裕，有助于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为中国经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创造机遇。而“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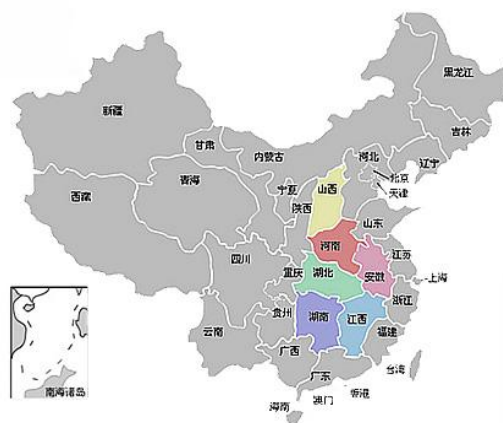


图 1 中部六省示意图(中国商务部网)

就地理位置而言，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六省，处于华夏腹地，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就人口而言，中部六省人口为 3.65 亿，占全国人口的 28.1%，其中农村人口 2.44 亿，占全国农村人口近 1/3。2008 年，中部六省 GDP 实现 62153 亿元，占全国比重的 24%。如果六省发展起来，人民收入显著提高，自然有利于拉动内需，逐渐使中国经济摆脱对出口的依赖。[4]

针对中部六省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国务院于 2006 年 4 月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2007 年 4 月 13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负责研究中中部地区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和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有关工作，还下发了《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使中部六省享受历史欠税豁免、税收优惠等多项优惠政策。2010 年，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和《关于促进

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未来5到10年中部崛起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为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提供战略指导。

在国家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前后，中部六省也结合各自实际，开始探索崛起之路。例如江西依据区位优势，谋求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对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化，建设了特色鲜明的昌——九工业走廊。湖北在抓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同时，也在抓县域经济发展，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黄冈、鄂州、天门等多座城市的武汉经济圈已经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此外，中部各省之间也加强了合作，如定期举办中国中部贸易投资博览会和中部崛起高层论坛，为探讨、完善中部区域合作搭建交流、沟通、合作的平台。

总的来说，“中部崛起”战略是有一系列条件作为支撑的。就资源结构而言，中部地区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作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拥有较好的农业基础。2004年，全国粮食增产的56%来自中部。[5] 2006年，中部六省粮食总量1.57亿吨，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占全国的31.6%。[6] 二是拥有较为集中的工业布局。例如全国40大工业门类，河南就有39大门类，其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食品工业、轻纺工业等都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7] 三是能源比较丰富。例如山西的煤炭的储量、产量、净调出量和出口量，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人才优势也比较明显，安徽科技大学等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设在该地区。这一切决定了中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II. 中国中部崛起的制约因素

不过，目前仍然有一些因素对中部崛起形成制约：例如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在现阶段，中部地区虽然形成了第二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但各省工业产品结构趋同，例如在39个产

业中，被各省共同列为支柱产业的竟有14个之多，烟草、石化、电力、食品、钢铁为五省共有，有色、煤炭采选、汽车为三省共有。[8] 这又使得这一地区产品集中度和生产集约化程度比较低，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比较弱。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2009年12月印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反映，江西稀土冶炼企业平均规模不足2000吨，河南规模以上氮肥企业平均产量不足10万吨，湖北磷肥企业平均产量不足4万吨。虽然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全国水平略高，却是以传统的流通和服务业为主，为现代工业服务的金融、通讯和信息产业相当薄弱。[9] 此外，中部地区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的问题，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投入、该地区获得的专利数目都比较低。而且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的现象仍比较普遍。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吸引区域外生产要素流入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0]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部地区的一些行业受到了一定影响，例如钢铁、炼焦等行业处于市场萎缩的压力下，河北一大批小规模钢铁厂、山西的一些钢铁厂，甚至包括一些省份的大型钢铁厂炉子都大幅压缩生产，呈现所谓的“闷炉现象”。此外，东部地区原本欣欣向荣的轻工产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中部近些年来发展劳务经济的努力也无异于是一个打击，作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的外出务工收入显著缩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部各省之间对外来资本的争夺也更趋激烈，比环境、抢客商、争项目，态势逼人。[11]

面对上述挑战，工信部在其《方案》中提出了调整优化中部六省产业结构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其指导思想是以技术改造、兼并重组、淘汰落后、节能减排降耗为重点，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转变原材料工业发展方式，提高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其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四个“结合”，一是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相结合；二是兼并重组与体制创新相结合；三是技术改造与淘汰落后相结合；四是发挥本地优势与区域产业互补相结合。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包括：1、在兼并重组方面，大幅压缩钢铁冶炼企业数量，培育1家具有国际竞争力、2-3家在国内有较强竞争力的钢铁企业集团；重点培育1-2家具有国际竞争力、5-8家在国内领先的大型有色金属企业集团；培育1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建材企业集团，初步形成8家以上年产能超千万吨的区域性水泥企业集团；年销售收入超百亿的化工企业达到10家以上。2、在产能升级方面，按期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金属和非金属深加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的比重，强为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新材料的能力。3、在技术创新方面，力争在关键工艺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以及高端产品研发、生产和应用技术等方面取得新突破。4、在优化产业布局方面，进一步优化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与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环境承载能力等相协调的原材料工业布局，进一步壮大沿江、沿主要交通干线和能源、资源产地的原材料工业基地，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区域特色、比较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最后，还要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积极成效。[12]

在工信部的《方案》正式出台前后，中部各省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

例如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江西省2009年6月着手实施科技创新“六个一”工程，计划在2009—2012年间主攻10个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培育100个创新型企业、实施100项重大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建设10个国家及研发平台、办好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基地、组建100个优势科技创新团队。[13]安徽省也在2009年8月出台了《关于增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区域自主创新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力争在3—5年内提高

全省高校的四项能力：1、“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2、“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3、“产学研结合和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绩效”、4、“成果转化和培育创新型产业能力”。根据这个文件，安徽高校要通过实施各类人才计划和创新岗位设置会聚200名左右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打造50个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建成200个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落实产学研合作项目1000项，申请专利2000项，培育创新型企业 and 高新技术企业100家，培养数以十万计创新型产业急需的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使全省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和整体竞争能力跃居中部地区前列。[14]

此外，中部各省还抓住国家扩大内需、产业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机遇，积极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经济适用房以及公共建设工程等项目，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补贴、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改革等方式带动了城乡居民消费，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工业快速下滑的势头，保持了消费需求的旺盛，经济总体运行情况比较乐观。[15]

不过除了凭借自身的条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之外，中部各省还需要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共同克服以往发展模式的危机，其中，中部与东部省份加强合作，对于推动中部崛起和中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III. 中、东部合作推动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离不开中、东部之间更为密切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地区经济发展很难孤立地进行，“中部崛起”不仅必须是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得到推动，还要借重世界和东亚地区的资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通过

率先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产业转移，成长为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出口加工基地。在这一过程中，“珠三角”和“长三角”既是汇集国际资金、先进技术、专业人才的地区，也是吸收包括中部省份在内的广大内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地区，还是内地经济建设所依赖的投资来源地之一。近几年来，中部六省大量投资都来自于东部沿海地区，江西、安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安徽引进的省外投资中，来自江、浙、沪的民营资本占70%以上。东部沿海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也争相到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的各类开发区落户。[16]“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资金、技术、管理模式、专业服务以及与港、澳、台三地的密切经济联系，如果能够与中部的自然资源、产业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合理结合，必然对中部崛起产生强劲的推动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东部可以成为中部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平台。

第二，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国际竞争力下降，资源刚性约束难以破解，面临提升产业结构、追求自主创新能力的巨大压力。金融危机加大了这种压力，迫使“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加大力度，抛弃低成本、低利润、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代之以基于高科技、高效益、低消耗的新型增长模式。例如广东省在2008年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就是试图通过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改变目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实际上，现在“珠三角”面临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长三角”、环渤海及其他沿海地区面临的问题，这些地区也应根据本地实际，居安思危，加快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步伐，以保障沿海地区经济在较长时间能够可持续的和较快的发展。[17]可以预期，作为对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一种反思，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对内地的产业转移活动在今后

一段时期会有增无减，而中部六省以其地理位置、资源构成等因素，可以为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东部的资金可以在此找到新的投放地点，其商品和服务可以开拓新的消费市场。与此同时，中部地区也可以抓住东部产业转移的机会，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升本地区工业化水平和整体经济水平。

第三，金融危机也凸显了中部和东部所面对的某些挑战存在关联性，必须通过加强协调与合作加以应对。例如，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内陆农村富余劳动力，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世界加工业基地的一个重要元素，长期以来，这个被称为“农民工”或“打工仔”的群体，成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产品保持低成本优势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东部市场对内地劳动力的需求又在客观上缓和了中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而且，“农民工”与家乡的密切联系使得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家乡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由于外贸订单的大幅减少，东部大批依赖于外贸的企业陷入倒闭、停产状态，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大为压缩，以致劳资纠纷频发，大量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看到家乡也缺乏吸收自己再就业的空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均构成了隐患。[18]想要有效处理这个问题，东部和中部有必要在政策制定的过程进行协调联动，使政策相互配合、合理分担各自肩上的压力。

目前，中部、东部各省市已经通过加强合作推动“中部崛起”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例如安徽为自己确定的战略定位是，发挥在地域上与“长三角”无缝对接的优势，“实施东向战略、发展东向经济”，形成商品东进、劳务东输、能源东送、产业东接、投资东引、服务东带、交通东连、游客东来的新局面。[19]江西省近几年不仅盯住“长三角”，而且把眼光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题园项目、投资 5 亿元旅游开发项目、投资 3 亿元的物流园区项目也纷纷落户谷城。[24]

不过，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省份通过加强合作推动“中部崛起”还处于探索阶段，合作的体制、机制尚有待完善。当前，双方合作的内容除了招商引资和援建项目外，可能至少还须考虑：一、围绕产业承接与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区域间的政策协调；二、如何发挥东部、中部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上存在的互补性，使“中部崛起”不至留于对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模式的盲目复制。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东、中部地区如何找准和实现在国家宏观区域发展规划中的定位，而区域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协调，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参与和引导。

IV. 结论与建议

世界金融危机将中国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性凸现了出来，在中国区域发展布局当中，中部六省地处中枢，承东启西，推动“中部崛起”，对于中国摆脱自身发展的危机，提升发展的层次，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通过加强合作来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途径。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央、东部和中部地方政府的共同参与和协调联动。

中央政府应当为东、中部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提供指导，创造条件，为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劳动力安置等问题提供宏观政策引导，杜绝各自为政、扰乱区域发展布局的无序状态。特别是，中央政府应以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长江航运建设为重点，着力构建中部与三大经济区域接轨、中部省份相互沟通的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全面提升中部地区在全国路网格局中的枢纽地位，支持中部地区干线铁路电气化改造和复线建设，抓紧建设徐州-西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国家规划的铁路客运专线，提高铁路的综合运输能力；加强六省省会城市的空港建设，

投向整个沿海发达地区，其战略定位是：把江西建设成沿海发达地区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即把江西建成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的“后花园”。从而全面“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20] 湖南省重点是做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湘中经济走廊，发展湘西经济带。同时实行南向战略，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实现与“珠三角”的交通互连、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互享，并参与泛珠三角合作，扩大与港澳地区交流。[21]

根据中国中部崛起网报道，自国务院确定江苏省重点对口支援湖北省三峡库区以来，江苏在秭归县实施对口支援项目 43 项，支援资金 2.02 亿元。其中，援助公益项目 36 项，无偿援助资金 4200 万元，援助物资折款 265 万元，重点援建了希望小学等一批社会公益项目。苏鄂两省积极推动对口支援从扶贫型向开发型、从输血型向造血型、从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转变。[22]

2007 年 7 月 13 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合作交流对口支援工作会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交流和对口支援工作是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加快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他主张进一步拓展合作交流新思路，更加注重发挥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服务、辐射、带动功能，积极构建各类服务平台，特别是增强金融、期货、产权、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的服务功能，帮助各地来沪企业“借梯登高，借船出海”。[23] 2008 年 12 月，湖北谷城上海投资环境说明会签约仪式在上海市松江区举行，一举签署投资协议 14 个，投资总额 62.29 亿元。签署的投资项目有：总投资 16 亿元的家具工业园项目落户谷城县石花经济开发区，上海观航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17.89 亿元，在谷城建设水电及电力工业产品园区，投资 9 亿元的庙岗林场转让项目、投资 6 亿元的现代农业主

对机场的改扩建工程给予资金支持；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公路建设的支持力度。[25]

东部和中部的地方政府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尊重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围绕制定产业政策和反危机措施等问题进行密切的、制度化的沟通协调，避免产业转移的盲目性和短期效应，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安置创造良好的环境，采取“共担风险”而非“转嫁风险”的做法。中国中部崛起与东部发展密不可分，就是决定中国和谐发展的基础。中部地区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塑造高效廉洁的政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东部的市场经验，为吸引外部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

而中部和东部的合作是否能够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四个因素的结合：一是合作给中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中部和东部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互补的基本格局；三是形成了一个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保障和规范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四是中部地区的民生在合作中得到了显著提高。

注释*

* 本文是作者2009年3月在中国澳门大学国际研讨会发表的文章为基础而修改。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彬先生的热情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¹ 王成至，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参阅白晔、吴三忙：“论金融危机对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的差别性影响”，《商业时代》2010年第5期，第46—48页。

[2] 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09年初，中国1.2亿农民工中大约有1/4（即3000万人）

返回了家乡，其中约20%的人是因为自己所在的工厂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停产、半停产而回家。法国新闻社北京2009年1月22日电。

[3] 参阅陈栋生：“走向协调发展之路——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巨变”，《珠江经济》，2008年11期，第4—7页。

[4] 参阅郭小兰、徐长乐、杜丽菲：“中部崛起发展模式战略思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2卷第2期（2008年6月），第114—117页，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统计数据。

[5] 《中部六省调查研究报告：抢抓机遇 奋力崛起》，《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03月29日。

[6] 《2006年安徽及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安徽统计信息网》，2007年04月29日。

[7] 《中部崛起战略谈：专访中部六省书记、省长》，《人民网》，2005年2月24日。

[8]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2009~2010年中部地区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2009年12月2日。

[9] 《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2009年12月11日。

[10] 参阅《“中部崛起”存在六大“软肋”亟须加力解决》，《经济参考报》2006年1月6日。

[11] 参阅张可：“金融危机下中部崛起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年第12期，第20页。

[12] 《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2009年12月11日。

[13]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六个一”工程的实施意见》，2009年6月15日。

[14] 《关于增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区域自主创新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9年8月17日。

[15]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2009~2010 年中部地区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2009 年 12 月 2 日。

[16] 《中部六省调查研究报告：抢抓机遇 奋力崛起》，《中国经济时报》，2006 年 3 月 29 日。

[17] 曾敏丽：《“腾笼换鸟”：广东样本演绎新故事》，《金融时报》2008 年 09 月 19 日。

[18] 参阅马雪松、张晓霞：“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问题调查与分析——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9 年第 8 期，第 213—221 页。

[19] 《中部六省调查研究报告：抢抓机遇 奋力崛起》，《中国经济时报》，2006 年 3 月 29 日。

[20] 《中部六省调查研究报告：抢抓机遇 奋力崛起》，《中国经济时报》，2006 年 3 月 29 日。

[21] 《中部六省调查研究报告：抢抓机遇 奋力崛起》，《中国经济时报》，2006 年 3 月 29 日。

[22] 《情系三峡惠泽两省，江苏湖北推动对口支援促双赢》，《湖北日报》，2007 年 3 月 24 日。

[23] 《武汉市经济技术协作办综合处信息》2007 年第 33 期。

[24] 《湖北日报》，2008 年 12 月 19 日。

[25] 《从要概念到要政策中部崛起六省合力》，《中国企业报》，2005 年 6 月 20 日。